



相关链接

9月16日,韩少功长篇新作《日夜书》长沙研讨会观点精选:

《日夜书》的反讽,是这部小说写作的逻辑起点,具有一种对民族进行反思的历史情怀。这些反讽就像戏剧中的笑场,而作者是笑在最后的那个人。韩少功摒弃了非常态的人生和写作,从常态的日常生活琐事中表现出石破天惊。

■王跃文(湖南省作协专职副主席)

写作这部小说时,韩少功把以往知青小说的写作范式抛弃掉了,可以说是知青文学的终结者。从《西望茅草地》到《日夜书》,韩少功的历史观也日渐成熟。这里面有一种非常暧昧的情结,就是一个人怎么去看待一段自己有着切身之痛的历史时抛下一切直观情绪,怎么在一个历史的具体情境中去写人。

■刘复生(海南文学院院长,文学博士)

散文化的思路,诗意化的抒情,辞条化的叙述方式,说书人的讲述方式。这就是《日夜书》实现的文体创新。

■夏义生(湖南省文联副主席)

《日夜书》是韩少功的精神漫游,是一代人的精神史、心灵史、思想成长史。小说把知青放在这两个大的时代背景下进行思考。韩少功在面对这两个时代时都是悲观的,并赋予其一种宗教意识和悲悯意识。

■刘绍峰(湖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

这是智者的写作。韩少功是个十分理性的人,他的小说,有明确的自觉意识。他知道他要什么。许多作家是本能而混沌地创作着,少功从来不是。《日夜书》实现了理性与感性的平衡与融合,它要表现的,是一个时代及这一代人的群雕,是一代人苍郁悲凉的生命史和精神史。

■龚旭东(三湘都市报副总编辑,湖南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日夜书》运用散点透视的方法表现了一代人的精神记忆,分析反思了知青后遗症和这代人的复杂性。

■张柠(北师大文学院教授)

这是知青小说中的“反思书写”,具有一种立足当下的精神的制高点,将过去和当下对照深入地思考知青时代,对“后知青时代”的批评甚于对知青时代的批判。

■王春林(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

《日夜书》是一部昆德拉式的小说,其中众声喧哗,用音乐术语来形容就是一部多重演奏的奏鸣曲。它比韩少功以往的任何长篇小说都更像长篇小说,是他在小说文体创新上“进步的回退”,或者说是“以退为进”。

■李遇春(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叁 试错、成长、自我认识

我的消费习惯可能比有些农民工还要简单

都市周末:学术界往往从精神导师的角度,将您与鲁迅先生相比,又在湘西题材的写作上,将您与沈从文先生相比。您自己如何看待?在写作上,您是一个起点很高的人吗?什么时候开始确认自己有写作才华并明确方向的?您是如何开始架构您的第一个故事的?

韩少功:不要相信那些话。我也是从一年级开始的,眼下的版本也高不到哪里去。

恐怕没有任何人可以事先知道自己的潜能,只有一步一步干起来,摸爬滚打,酸甜苦辣,才会慢慢明白自己该干什么,哪些事干不了,或不该干。靠谱的自我

认识从来都是在实践之后,不是在此之前。我最开始是写戏剧,后来发现自己干不好这个活,就放弃了。这是一个不断“试错”和不断调整的过程。

都市周末:童年生活中谁是您最亲近的人,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韩少功:亲人、老师、朋友甚至敌人,在严格意义上都是我们的老师,都会给我们重大的影响。不是每一个人的外婆都会讲故事,不是每一个人的妈妈都会唱民谣,不是每一个人的父亲都有家学传承,但如果一个人愿意学习,哪怕一个小偷和一个白痴,都能给我们启

发。他们可能讲了九句废话,但只有一句话说得好,被我们注意了,就可能影响我们一辈子。

都市周末:有过那种成长的痛苦或转折点吗?当时靠什么给青春镇痛?

韩少功:一是志向,一是热情,包括学习与工作的热情。一个年轻人有了这两条,就有了金刚不坏之身,能把任何艰难的时光过得快乐的时光。

都市周末:生活和写作中,什么样的人最容易引起您的兴趣?除了写作,日常生活中还喜欢做些什么?

韩少功:能挑战既有思

维和感受的现象,最能让我兴奋。这就是说,如果遭遇了既有说法解释不了的东西,自己有陌生感的东西,就可能是好东西。一个少女爱上了一个帅哥,这种事可能不会让我注意。但一个少女爱上了一个丑八怪,违反了常识性逻辑,这件事可能就值得我琢磨一下了。人云亦云不叫创作,不断发现人性奥秘才是作者应有的看家本领。

我喜欢与非文学圈的人打交道,这也许算一个爱好吧。至于生活习惯,好像乏善可陈,常喝茶,抽几根烟,吃几碗饭,就这样了。我的消费习惯可能比有些农民工还要简单。

肆 文字与生活的调频

没有辣椒的地方都不会特别可爱,没有亲友的地方都不是故乡

都市周末:您的两部翻译著作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带来了国内阅读米兰·昆德拉的热潮,《惶然录》获得了很好的口碑。您自己怎么看待翻译和您的这一重身份?翻译的经历对您的写作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韩少功:翻译是我拾遗补缺的例外,看到什么书被漏译了,有时偶尔会插一手。翻译是阅读和学习的方法之一,不同语种的对比,可以帮助自己对语言的性能、品相有更多体会。所谓“语言是一种文化”,做翻译的人也许能更好地理解这一点。

都市周末:在我看来,您的写作文字古朴、原生态,但翻译文字却很优雅,甚至有人将《惶然录》和陈实的译本《不安之书》做比较,认为您更书斋气,她更口语化,您怎么看?您是如何处理这两种语感的关系的?

韩少功:我没做过两个版本的比对,因此说不出什么。至于语感,可能要根据描写对象相机变化,比如你写一个杀猪佬,文绉绉的肯定不大对头。有些动画片里儿童开口就是成语,也十分可笑。

都市周末:现在回汨罗,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

么?能不能稍微介绍您在汨罗一天的生活?您现在一半时间在海南,一半时间在汨罗,海南似乎代表着现代生活,汨罗则更接近乡土生活,您如何让这两种生活互动交融?

韩少功:在汨罗又住了十三个半年,已经很熟悉了,回来不会怎么觉得新奇,只会觉得亲切。我在乡下同样读书、写作、上网,不同的是多一点农活,多一些乡亲。生活中多了一些植物和动物,月光和日光,其实是很享受的。

给自己换一个频道不是太难,决不会比办公桌转

换麻将桌更难,不会比一个教授兼职炒股更难。

都市周末:在国外您待过的城市中,有特别喜欢的地方吗?您觉得长沙、汨罗、海南哪一个地方才真正寄托了您的乡愁?

韩少功:没有辣椒的地方都不会特别可爱,没有亲友的地方都不是故乡。这样说起来,长沙、汨罗、海南这些地方都不错。

■文/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李婷婷

记者手记

在不同语感、身份和生活之间调频

□李婷婷

韩少功曾在《访法散记·我心归去》中说:使你热泪突然涌流的想象,常常是故乡的小径,故乡的月夜。月夜下的草坡泛着银色的光泽,一只小羊还未归家,或者一只犁头还插在地边等待明天。

在“马桥”,韩少功曾度过了六年的知青生活。《日夜书》里,他再次借助“知青”这一视角,书写今昔对照中的乡土。时代的石子激起的苦涩涟漪,也为今天的关照投下一层诗意的波纹。这段青春记忆,与他日后的经历和写作都无法剥离,成为一个创作“泉眼”,放大、延展了他的青春期,也成为他解脱都市精神危机的理想之地。

从语言上看,被乡土和方言浸润的语感,显得质

朴、粗粝、原生态。而另一种近乎相反的语感,却出现在他的翻译作品中。

国内很少有人提及韩少功是一个“翻译家”,但我却是通过他的翻译知道了他。2001年冬天,我在书店看到《惶然录》。那时我尚未高中毕业。12年来,辗转几个城市,这是为数不多必将随身携带的书,费尔南多·佩索阿也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翻译不仅是不同语种的对照,更是与另一个作者在不同时空的对话交融。佩索阿觉得自己就是一个集群,是自己的同者又是异者。或许,作为《惶然录》的译者,韩少功也在自己身上发现了一个“佩索阿”,以他的身份和视角来检视自己的写作,让书中作者的自我怀疑和自我对抗,呈现出

一种自适与自洽。

韩少功认为,翻译对他来说是读书的副业,是拾遗家之遗漏。但在国内引发的“昆德拉热”和“佩索阿热”,都得益于这场“拾遗”的掀动,进一步打开了中国读者的阅读视野。一定曾有很多和我一样的学生和年轻读者,因为韩少功的“拾遗”,让更多东欧、南欧等小语种作家的作品,进入了自己的书架。

与小说的方言、口语化的写作方式不同,在与韩刚合作翻译昆德拉时,韩少功“竭力保留作者明朗、简洁、缜密、凝重有力的语言风格”;《惶然录》也被普遍认为相比陈实的译本《不安之书》更优雅、书斋气。在写作与翻译之间,韩少功完成了不同语感的调频。

13年前,他辞去海南省作协主席和《天涯》杂志社社长职务,完成了体制内与体制外身份的调频。他认为,到处都有“体制”,我们只能靠警觉争取人格的独立。如今,他在海南的“现代生活”与汨罗的“乡土生活”之间调频,更多地享受植物、动物带来的宁静,享受乡村的白日和夜晚清冷的月光。

“你来自黑暗,又归于黑暗,经历了一次短暂的苏醒。你将回到父亲和母亲那里,回到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那里,回到已故的所有人那里,与他们团聚,不再分离。你是不是有一种归家的欢欣。”

正如他在《日夜书》中这样说。